

东方 美学

陈伟 王捷 / 编著

对西方的影响



DONGFANG
MEIXUE
DUIXIFANG
DE
YINGXIANG

2-09

林出版社

东方 美学

陈伟 王捷 / 编著

对西方的影响



DONGFANG

MEIXUE

DUIXIFANG

DE

YINGXIANG

学林出版社

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西方汉学之概观(代序)

王海龙*

耶鲁大学著名的汉学家乔纳珊·D·斯宾瑟教授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在1694年的法国巴黎，发生了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件——一个中国的公主被海盗掳掠到这儿。据说这是法国人第一次见到中国女人。事实是这样的：这个女人说她是中国公主，是康熙皇帝的女儿，她被皇帝嫁给日本的皇子，但不幸在海上被荷兰海盗掳去，陪伴她的母亲死在了海上，她则被荷兰海盗带到了欧洲。这艘船后又被与之交战的法国船俘获，这样这位中国公主就被带到了巴黎。这一切，都是这位公主用磕磕绊绊的法语叙述的。

这件事在三百年前的法国当然是一个爆炸性新闻。大家都争相前来看看这个东方人，这个中国皇帝的女儿是啥模样？一些最有名的法国贵妇人，甚至皇族都来认她作干女儿，给她买最高贵的华服，吃丰饌珍馐，给她最好的照顾；教她最高贵的宫廷礼

* 作者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西方文化研究的访问学者。

仪,并劝她放弃中国宗教信仰而皈依神圣的天主教。这一切都闹得沸沸扬扬。

不巧得很,这轰动一时的巨大传闻当然也震动了当时巴黎研究中国或对中国学问有兴趣的小圈子(严格地讲,那时还谈不上有汉学),适时恰有一位在中国传教20年刚回巴黎的耶稣会修士。闻得此讯,他辗转托门路去会见这位中国公主。可不幸,当他用汉语同这位“中国公主”交谈时,这位“中国公主”一点也听不懂。她用一种稀奇古怪的语言同这位修士谈话,并坚称她说的才是正宗的“汉语”。在当时,国内没有其他懂汉语的人可以判别,人们只能听信“中国公主”说的是纯正的汉语而修士说的不是。

受尽冤枉的修士不甘心,特别是他看到这女人模样儿根本不像中国人,于是他想出了另一招儿,回去拿了一本中文书请这“中国公主”读,想以此来揭穿她。没想到“中国公主”毫不含糊,拿到书后就又响又快地嗷嗷地读了起来,神情既投入又认真,可惜,她读的根本就不是中文。修士明知她念的不是汉语,但“公主”死死咬定她念的是汉语。因为她的身份是“中国人”,所以这次她自然又赢了。

当然,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位“中国公主”的马脚露出得愈来愈多,以致于最后几乎没有人再听信她的辩言。那么,一个外国女人为什么要冒充中国人,要冒充中国皇帝的女儿呢?直到她风烛残年,这个女人才给予了她痛切的回答:“我是一个十分贫寒的法国女人。如果我是法国人,没有任何人会关心照顾我,但只要我摇身一变成了中国人,我所有的好年景都会来了。”^①

① Jonathan D.Spence,To Change Europe:The First Chinese in France, 1680~1735.The John faulton Lecture in the Liberal Arts,Middlebury Vermont 1989, pp.8—10.

从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那块神奇的土地是多么地富有魅力，又是多么地富有号召力！作为那时代西方文化先锋代表的法国人又是多么地景仰那圣地般的中国。几乎在那个冒充中国人的无名法国女人时代之前三百年，中国在西方已经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瑰丽的梦了。14世纪中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已经轰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中国成了西方人的文明梦境，成了他们的“理想国”和奋斗目标。这种局面不仅延续到了“中国公主”时代，而且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初叶。它不仅轰动并影响了西方各国的一般民众，而且连著名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都加入了这个赞美中华的大合唱。可惜，由于路途的遥远和当时的科技、交通的局限，这些最狂热的中国信徒们大多没有亲睹其崇拜的中国的荣幸。

在“中国公主”事件轰动法国上百年后，世界著名的大文豪歌德在他的晚年也迷上了中国。这位伟大的诗人用他最优美的诗章赞美中国。在他晚年同他的秘书爱克曼的对话中，称中国是个最文明、最人道的国家。他读了译成西文的中国小说《好逑传》、《玉娇李》后，激动得不能自制，同他的秘书阔论中国文明的伟大，开化历史的悠久，然后大发感慨：“在我们祖宗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中国就有了这么精致优雅伟大的文明……”^①可惜这段话当时没人传给中国，否则我们的先贤祖宗肯定会无比兴奋。

其实，以这样高的热情赞美中国的远不止歌德一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大师们都极力称颂过中国。哲学大师伏尔泰

^① John Peter Eckermann. *Conversations of Goethe with Eckermann*. trans. John Oxenford PP.164, New York, Dutton, 1930.

盛赞过中国文明的伟大感召力，并坚称世界历史的真正开端不是《圣经》纪年的时代而应以中国文明为发端。伏尔泰特别赞誉中国的法律不仅为了惩恶而且还为了扬善，这是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法律制度的。此外，伏尔泰还颂扬了中国美学和中国人的审美观。另据史书记载，美国著名政治家、发明家富兰克林曾购买了大量关于中国社会组织之书加以探讨，甚至企图派大员们到中国去代表“年轻的美国”学习古老的中国法律。另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美国总统、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弗逊竟称誉中国人是“天生的贵族”^①。

在这些先贤和西方老百姓的眼里，中国曾是何等的风光！中国人是何等的伟大！

西方人是那么渴望地了解这个神奇而富庶的国度，但可惜他们所能得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又那么少。从文艺复兴肇始以后的几百年来，尽管“东方热”一再加温，可关于神秘的中华帝国的著作除了《东方见闻录》以外，竟乏善可陈。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人类对于自己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有热情；热望越高，目标物越是难以企及则吸引力就越大。这种吸引力或热望的极度高扬则会产生对目标物的夸张或神化或美化，其结果当然会脱离事实。

中国学抑或汉学就是这么带着夺目的光环走入西方文化视野的。前面我们引述过大文豪歌德曾经怀着那么崇高的热忱礼赞过中国文化，其实是受到德国学术界景仰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如果我们把歌德的这段话同早他一百年的一位前辈，自诩为“西方汉学之父”的普鲁士早期汉学家贝耶的议论对照一下，我

^① J.D.Spence, Chinese Roundabout, W.W.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92, pp.81~83.

们会知道歌德的评论是早有其学术渊源的。贝耶在他的煌煌巨著《汉学博览》的绪论中说：“中国又一次活脱脱地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它的人民受过那么良好的教化，遵循着他们祖上先贤的礼乐诗书的陶冶，他们礼貌、优雅、品性高贵。它的这些光荣足以胜过我们这些欧洲国家。”^①

说到汉学家贝耶，我有必要多说几句。不是因为他一生遭遇的传奇性和充满扑朔迷离的悲剧色彩；而是他的探索、执着，为汉学而献身的短短一生的经历，确实代表着早期西方汉学家对汉学探讨的坚韧、挫折、虔诚、谦恭、盲目、勇敢以及悲剧性的荒诞。

贝耶 1694 年生于东普鲁士的一个小镇，父亲是位画家。他在中学及大学里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希腊、拉丁和希伯来等古典语言。在他 19 岁时，像得到了神示似的，忽然立志要研究汉学——那个在东方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神秘国度的学问。在他后来的自传里，他描述了自己那瞬间的灵感和雷殛一般的感情：“1713 年的一天，当我呆在乡下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我被一种突如其来地强烈的想学习汉语的情感攫住了。在那些日子里，我着魔般地搜寻、学习和思考着怎样才能进入那神秘的疆域。我曾想到，如果我在这个领域里哪怕能作出一点小小的贡献，我也会自豪地把自己列入众神之孙和众王之王。就像一只怀孕的母兔，我收集了所有的东西在我的洞穴里——我找了所能找到的字典和介绍汉语、中国文学规则的所有资料。”^②

怀着这个雄心勃勃和神秘兮兮的愿望，贝耶辗转于他所居

① Kund Lundbeak, T.S. Bayer: Pioneer Sinologist, London and Malmo, 1986 pp.43.

② Kund Lundbeak, T.S. Bayer: Pioneer Sinologist, London and Malmon, 1986. pp.92.

住的小镇、柏林和俄国彼得堡。这只怀孕的兔子在他的洞穴里苦苦地咬啮着、整合着，整整辛苦工作了17个年头，可惜，它生出的却是一只怪胎。

1730年，贝耶终于出版了两巨册《汉学博览》。它被称作欧洲研究汉学的第一部著作，被认为是一部气度恢宏，但荒诞不经的著作。贝耶蛰伏在洞穴里孕育那么久生出来的成果，不久便被法国汉学界和东方学专家们批得体无完肤。可怜的贝耶读了这些刻薄的书评旋即郁郁而终。

据现代西方汉学家们的考据，贝耶的书并非那么无价值和荒唐。他收集了在他那个时代所能得到的重要材料，总结分析了各家成果；遗憾的是，他依然陷入了那个时代欧洲东方学家们传统的窠臼，总是极力去寻找解读汉语和中国文化这个神秘的泥沼后面的规律的“那个万能钥匙”，以为这个钥匙一朝在手，一声“芝麻开门”就会万事迎刃而解，人人都变成“中国通”了。这个命题起点的虚假性导致他最终走进了死胡同。但是，贝耶的勇敢和真诚还是令人钦佩的。在那个年代，他并不深通中文，手头也没有几本中文书籍、字典和像样的参考资料，却怀着那样的雄心，磕磕绊绊，辗转于古道风尘，四处求访，而且几乎没有真正的学术同道可以对话；他筚路蓝缕，殚精竭虑，向既定的目标努力。由于通讯不便，他甚至连一些极简单的语言学上的问题，在当时与人通信讨论也要等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得到回答——这还要靠幸运：信件没有在半途丢失。贝耶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境遇下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梦想与失败被喻为早期西方汉学发展史的道路曲折、命运艰难的一种文化象征。

贝耶的著作应该说是建设性的。他的本意是想更正早期学者的谬误——在汉学萌芽时期，有些学者和传教士仅凭勇气作为拓荒者涉足汉学界，但并没有化足够的时间和气力去学好

汉语。有感于此，贝耶想补救并矫正他们的过失。他综合研究了当时人们的所有成果。从他的书目和研究名单上，我们确可看出他博采众长，以及对欧洲各家学说的评论。尽管他的有些观点本身的价值也是值得怀疑的。比如，当时英国学者约翰·韦伯终其毕生学术生涯求证汉语是世界上第一种语言，认为它是世界上所有语言的“母亲”。荷兰学者伊萨克·沃休斯认为中国的艺术与科学遥遥领先于所有国家，而且“强烈表示他宁愿被生为中国人而耻于自己的欧洲世界”。法国学者菲利普·麦逊曾“证明”汉语是希伯来语中的一支方言，它的知识可诠释《旧约》中的一切语言学上的难解之谜。如《旧约》中上帝为了拯救困在沙漠里的以色列孩子们从天上撒下来的食物“玛那”(Manna)，就是中国人所吃的普普通通的“馒头”(Man-tou)。讨论不清的千古之谜，只要你了解了汉语，事情就能那么简单地迎刃而解。瑞典学者奥拉欧斯·拉德贝克认为，汉语是离古哥特语最近的平行的一支。贝耶对上述学者的观点是兼收并蓄，“批判地继承”。他认为，尽管这些学说有其“模糊与肤浅”，但在他们热情的背后亦有其深刻、智慧和勤勉的一面。

最可称奇的是，贝耶在他书中讲到一位惊世骇俗的才子学人安迪亚斯·缪勒。这位出生在旧德国东北部的怪才声称，他琢磨出了一种解读汉语的魔钥匙(Clavis Sinica or “Key to Chinese”)，它可以在几天——顶多一个月——之内教会任何人汉语。但他不屑于，并拒绝和欧洲这几国人共享这绝活儿；另外，也因为他开出六千银马克的价码儿太高，无豪杰相购，一怒之下，缪勒烧掉了他所有的学术手稿，包括那名震四海的宝贝命根子“魔钥”，未已便撒手西去。在评价缪勒的生平和学术时，贝耶认为他作为学者是有点“贪婪”，但不乏创作性；尽管他中文方块字写得很坏，而且时常无可救药地误释中文的意思，但他在研究

汉语的特质上却有建设性的理论意义。如他用音叉去测量汉语四声的音度音位,“就像他在想像整个中华民族都在一个晚宴上歌唱——有的是在四重唱,有的是八音阶组唱,更有十六音阶组唱”!贝耶对缪勒的评价是很宽容的:尽管他有许多舛谬之处,但他始终是个“充满激情和理解的渴望,而且具有令人敬佩的创造力的学者”^①。

我以为,贝耶对缪勒的宽容评价也足可以作为墓志铭概括他本人的努力、宽厚而又悲剧性的一生。尽管他曾谦逊地声明他的《汉学博览》的本意“不是详尽地陈述自己在两大卷著作中完成了什么,当然也不是为了展示我的失败——是非曲直,只待读者去公断吧”^②。但可以想见,他那时的心情是很舒适和自信的。可是,他的读者们并没有他的那份对先贤的宽容。他的毕生之作受到了法国汉学界,尤其是埃蒂恩·福尔芒的猛烈抨击,使他从此一蹶不振。尽管如此,他在临死前给朋友的信中仍然称他尊重福尔芒的学识。这种敬重并不因福氏对他著作刻薄和残忍而稍减。在这儿,他说出了他最后的感人的,值得所有做学问的人终身记取的话:“我敬重我的对手的优点和价值,哪怕它是属于一个敌人。”^③

一个最宽容的学者却死于一个不宽容的同道者手里;一个终生为之献身,转徙呼号倡导汉学的学问家竟死在他虔诚热爱的汉学上。神秘的汉学一开始就给西方学界造出了这么大的轰动,学术界把它最优秀的儿子送上了其顶礼膜拜的祭坛,而世界的目光又一次转向了东方。经过这一系列的波折,西方更加热情

① Kund Lundbeak, T.S. Bayer: Pioneer Sinologist, London and Malmo, 1986. PP. 60—68.

②③ Kund Lundbeak, T.S. Bayer: Pioneer Sinologist, London and Malmo, 1986, PP. 43, PP. 92.

地呼唤着汉学,呼唤着中国学的产生。但真正的汉学和中国学产生后,它又揭示了些什么?它展示给西方世界关于神秘、古老的中国文化精神又是些什么呢?

二

西方汉学界作过回顾,如果不算那充满传说和炫耀色彩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西方第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是在1570年2月出版的葡萄牙人盖斯帕尔·达·克鲁兹写的《中华博物风土志》。这部洋洋29大章的著作虽竭力写实,但也是一曲绚丽的颂歌。达·克鲁兹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他凭着传教的雄心、对天主的爱和与葡萄牙探险家的交情,以及少得可怜的一点汉语知识,来到了遥远的中国。在这个梦一般的国度里,他兴奋地生活了许多时日,记下了很多事。这些日常琐事对西方世界来说,都是新鲜奇异的。克鲁兹不是要人,居住中国的日子多混迹于市井,书中所述也没有马克·波罗所经历的那么富有传奇色彩;尽管如此,在好奇的西方人眼中,它亦足以大饱眼福,因为中国毕竟是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世界。克鲁兹知道自己经历有限,不足以描写中国的全部,在书的前言里事先道了歉,但书的出版仍在西方引起了轰动。

我不知道克鲁兹的教育背景和他是否受过文学专业训练。但是,他的书确实是煽情的。他在他的大书前开宗明义地先声明:距离遥远的事情往往听起来比其本身有魅力而易于被夸大。但他敢保证,在他描写中国的这本书里,恰恰相反,不管怎样描写都难以言传中国的伟大与辉煌^①。在今天看来,克鲁兹的书无非是他在广东传教时的见闻。如广东音乐,广东人调教夜莺雌雄

① C.R.Boxer,ed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1953. pp.56.

分笼饲养以刺激其因恋慕于冬夜唱出三春的啼鸣之类的市井琐事。这些都成了这位早期中国通的灵感。克鲁兹是位热忱的传教士,而且真诚热爱中国。可惜他在广东呆了几年后于1569年回国述职,恰遇首都里斯本瘟疫流行,因无私地救助病人而染病身亡。在他死后两星期,这部凝结他心血和生命的大书恰好出版。他没能见到这本书,却享尽了身后的哀荣。这些离奇的遭遇和巧合更给神秘的中国和汉学罩上了扑朔迷离的色彩。而我们前面谈到的贝耶,乃至歌德们关于中国,关于汉学的知识以及对它的景仰也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产生的。

但是,渐渐出现了“不谐和音”。西方早期汉学家不可能亲自去中国,囿于时、地、语言及科技限制,他们也无从与中国的学术界产生对话。他们研究中国所能依据的第一手资料大都是上面所述的著作。但是,一、随着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人数增多,带回去关于中国的知识自然是多方面的,补充和纠正了以上所述著作中因无知和臆测而造成的误导;二、随着宗教教派斗争和政治分歧,早期教士的威信受到质疑,他们关于中国的纪录报道逐渐失去其影响力;三、启蒙时期的西方思想界、学术界盛赞中国也有其深刻的文化、宗教背景与思想目的性。有的学者并非真正了解中国而只想以它作为一种理想与参照系来批判当时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封建制度、宗教神学制度的沉滞和黑暗,其醉翁之意并不在酒。如启蒙运动的几乎所有杰出的大师都抒写过中国赞美诗。大哲学家、思想家莱布尼茨研究《易经》及中国秩序、伦理制度;大文豪伏尔泰写《中国孤儿》,孟德斯鸠和卢梭在著作里把中国当作圣地和理想国等。诗人和思想家歌德的赞美,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到19世纪末年,中国已经积贫积弱,西方已经可以自由出入中国。但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中国仍然是个美丽飘渺的仙梦。不仅对普通老百姓,即使对杰出的人物也是这样。其例可

见早期拿破仑那句中国是睡狮的名言及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对中国的迷狂和崇拜等——这都是后话。

我在前面谈及汉学萌发时追溯过其心理原因，越得不到的东西越想往、越神化其目的物。但一般而言，达到目的后会出现两种结果：或继续陶醉、享受这一成果，并力图保持住它；或失望于原来对目的物的错爱而冷淡并弃之。但走向成熟期的“中国热”却走了完全不同于上面所述的另一条道路。它既非“始乱终弃”，亦非“生死恋情”，也不是“若即若离”，反串一句现成的话，它始终被规范在“中为洋用”的基础上。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渐处于一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优越与攫取上——不论是在物质上或是精神上。西方对中国学或汉学研究的主流是有很强的致用目的的。它享用着它又贬抑着它。了解这一背景后，我们就不难明瞭下面对其产生原因的几点分析：

一、既然中国那么丰裕富有，像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那么渴望富庶，特别是刚从一千年黑暗停滞的中世纪崛起的西方为什么不能从它那儿捞点什么，取而代之或分一杯羹呢？这种愿望虽存在已久，但到18世纪及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及军事的强大，才给它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经商和航海术的进步更给这种觊觎提供了可行性。

二、随着与中国交往的增多和频繁的商业活动，不仅传教士、商人及各色人等皆进入中国。外来经济对沿海自给自足的旧有经济形式有所干扰。一向自大的中国人对西方的“蕃邦”及洋人并无好感。一方面，这种鄙视和敌意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客观评价；另一方面，各色西方人进入中国，把中国文化中的弱点，诸如女人裹小脚，溺毙女婴，包办婚姻等介绍到西方，为那些猎奇而又喜新厌旧的西方人津津乐道。这种情势在主观上影响了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在客观上又为对中国怀有野心、热衷于

殖民主义掠夺的别有用心者所利用，为其今后侵略、瓜分、占有中国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另一个内在原因是中国自身的。中国历史发展几千年，有其内在的成功与缺陷。可时至清朝，中国的科技与国势已落后于西方，但大清帝国自恃泱泱，金玉其外而贫弱其内，其势汹汹却不堪一击，以至在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国，以后又受到西方列强不断侵入。从此，这个曾经显赫于世的大帝国在西方面前遭尽了轻蔑和侮辱；即使真正热爱中国和汉学的西方人谈起她时，也只能怜悯多于赞美。若大的帝国败落了，真是“昨嫌紫蟒长，今怜破袄寒”了。

在学术界，1763年尼克拉斯·勃朗哥出版了《东方专制主义》一书。勃朗哥大拾启蒙思想家的牙慧，说中国人守法并不是伦理高尚而是怕被惩罚；中国式的教育毁坏人的性格多于陶冶于人的性格云云。而到了19世纪初叶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那里，则把中国说成了是游离于世界历史发展之外的一个异数。它超越了现代西方文化所评判的自由和成长的主题之外，永远封冻在人文精神发展的早期阶段^①。而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在19世纪中叶则说得更加露骨。他认为，中国要想进入当代世界，必须为西方重新塑造。中国曾经是“世界童年阶段的游戏场”，但是现在他则必须被逼着长大^②。受这种谬论误导的一般西方民众，一则为自身的优越感陶醉，为所谓“神圣使命感”驱遣；另则受好奇心和经济利益所鼓动；他们几乎“义愤填膺”一起来声讨中国，并要“改造”中国。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转型期的英帝

① G.W.F.Hegal,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 J.Sibree New York, Dover, 1956, pp.120~121.

② F.I.Carpenter, ed, Emerson and Asia. Cambridge: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237~239.

国主义在这时充当了急先锋，开始了以鸦片侵入瓜分中国的罪恶历史。鸦片战争后随着国势日衰，中国已经完全被刻毒和污蔑的文字蹂躏得惨不忍睹。中国的形象已经完全转向负面。而这一时期的西方“汉学家”们大多迎合着其政府与一般民众的口味，为虎作伥，把中国描绘成怪物：文化封闭，人性卑鄙，唯利是图，诡诈而无良知；中国人缺乏诚信，无革新能力，服从权威，俯首贴耳，是天生的奴隶。不幸的是，自那以后，污蔑中国人落后，无理性的谬论竟变成了一种正宗或者传统，成为西方社会、特别是非学术界的一般民众及舆论界认定东方或中国人的不成文的模式。

我们在今天考察历史的时候，可以平心静气地追忆这段史实。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面对这些刻骨铭心的耻辱和累累伤痕，心情确难以平静。

19世纪，关于中国的舆论误导和风向突转是与这一时期的所谓“汉学家们”的推波助澜的污蔑有直接关系。

随着西方列强觊觎中国野心的逐步暴露，清政府为了自保，开始排外。这当然更刺激了西方冒险家。特别在19世纪初，清政府为了杜绝鸦片和传教士造成的中国内乱，彻底闭关自守，禁止西方传教士、商人入境。

这些被拒的传教士和商人恼羞成怒。为了得到他们国内人们的声援和支持，继续赚钱和行骗，他们开始办杂志、出书，作舆论准备。为博取廉价的猎奇效果和同情，他们在出版物中竭力宣扬中国人的不人道、残酷无情和非理性，需要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教化；他们的工作如何受到中国人的阻挠；他们的殉道献身精神多么伟大，等等。为了举出实例，这些人也写了一些中国的风土人情、地理民俗知识等。这正是西方早期某些汉学杂志和汉学知识所产生的背景。

从这种居心叵测的视角出发,这些出版物当然不能公正地评价和介绍中国,其中的偏见、误导,无知的批评和污蔑谩骂是如此刻毒,以至于今天稍有良知的欧美学者都对之不能卒读。由于这些杂志书籍的出版全仗教会和商人们的金融支持,当然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这些人的传声筒,也自然成了那时不论是学者还是一般民众关于中国知识的主要来源。

这些刊物中影响较大的有英国人在马六甲出版的《印度支那集粹》(Indo-Chinese Gleaner, 1817~22)以及流产的《印度支那宝典》(Indo-Chinese Repository);德国传教士办的月刊《暹罗-天津旅航杂志》(Journal of a Voyage from Siam To Tientsin)以及美国传教士和商人合办的臭名昭著的《中国通》(Chinese Repository 1832—51)。它们的宣传大都为西方诸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张目,敦请其政府逼迫中国打开门户,允许传教和经商自由。由于它们都有国内外教会、商界募捐及私人支持,因此书刊的发行量都较大,并广泛投寄到大的机构、图书馆、博物馆等处,范围广及欧、亚、美、非诸大洲,其影响是非常恶劣的。以《中国通》为例,它在其全盛期发行量曾达到一千册。这个数目今天看来没什么了不起,可是考虑到当时西方最著名的期刊如《北美评论》、《西敏寺评论》在全世界的发行量尚不到三千册,这个无名而又低质量的小刊物的影响和能量就不可忽视了。我这样说的另一论据是,继鸦片战争英国胜利后,传教士和商人可以直奔中国。他们不再需要这些杂志为他们造声势,而当这些杂志造舆论的功能丧失后,得不到经济的支持,也就很快消声匿迹,寿终正寝了。西方评论家谈到这点时无不幽默地认为,这些杂志为中国门户的开放而大肆叫嚣,而一旦达到目的,它们自己竟成了第一个牺牲品,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①。而在评论这批杂志的内容和质量时,西方学者认为其“包含着明显的

偏见”，“带着基督教的烙印……去恶评中国和她的文明”^②。学者对它们的批评和鄙夷是显而易见的。据西方学者伊莉莎白·马尔孔考证，这些出版物大多产生在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其作者大多为商人、下层官吏和士兵。他们的货色远不能引起严肃的学者们的关注，“这些作者大都没受过什么像样的教育，大部分对汉语和中国文化极端无知。他们通常只是混迹下层和市井细民打交道”^③。知道了这些“书”的作者，我们大致就可以明瞭早期的“汉学家”是些什么样的货色了。但不幸的是，那时期偏偏是这些青皮浪荡子“有种”去闯荡中国这个未知的世界，而真正的贵族学者和读书人很少敢斗胆冒险来到动荡的中国。声称具有“第一手资料”的上述人等，在人们不知真情的状态下确能蒙蔽一些人的。

顺便说一句，据史料统计，在1815年到1832年间，英国每年都有一千到一千五百种新著出版发行；而从1816到1851年之间，英国共售出四万五千二百六十种著作^④。与这个数字相比，这些年间，这个号称崇尚学术的国度对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人口最多，文明最悠久的国家——中国的研究（到1850年止，英国公众所能读到关于中国的出版物仅四十本。也就是说，不到同期出版物的千分之一）不仅微乎其微，而且真正是少得可怜了。这种真正的研究和学术评价的缺席也确实给妖言惑众者提供了空间和发挥的余地。

①② Elizabeth L. Malcolm, *The Chinese Repository and Western Literature on China 1800 to 1850*, *Modern Asian Studies*,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1973) pp. 175, pp. 170.

③ *The Chinese Repository and Western Literature on China 1800 to 1850*, pp. 165~178.

④ Ian Jack, *English Literature 1815-183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pp. 38~39.